

美国盟伴体系专题

冷战后美国联盟体系扩张的逻辑

魏冰 刘丰

内容提要：在大国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美国近年来积极推动全球联盟体系扩张，这一现象可以用传统的权力制衡逻辑进行解释。然而，美国联盟体系扩张早在冷战结束之初就已经开始，当时美国在实力上遥遥领先其他国家。传统联盟理论假定联盟是用于制衡确定的对手，因而错误预测出美国联盟体系将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走向瘫痪或瓦解。实际上，在单极体系下，霸权国仍然会面临诸多不确定的安全风险，而联盟是其应对风险的有效工具。本文提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联盟体系的扩张服务于霸权护持的需要，但由于不同阶段的安全挑战不同，因此扩张的逻辑也不同：霸权维持阶段的扩张旨在制衡风险，霸权转移阶段的扩张则是为了制衡权力。其中，霸权维持阶段的扩张可能对潜在对手的安全利益产生负面影响，最终将潜在对手转变为实际对手。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联盟体系扩张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为美国霸权秩序的转型提供了内在的动力。

关键词：联盟体系扩张 霸权护持 风险制衡 权力制衡

作者简介：魏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刘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D871，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4) 05-0034-23

冷战结束之际，一批现实主义理论家纷纷断言美国联盟体系将开始收缩，甚至走向崩溃，原因在于美国及其盟友不再面临共同的外部对手。^① 共同对手消失确实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与其盟友间的关系松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在亚洲的五组双边联盟相继进入短暂的“漂流期”。进入21世纪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单边主义色彩越来越浓重，美国与其盟友间的矛盾也在加深，一个集中的表现就是美国与法、德等主要欧洲盟友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分歧。

然而，成员关系的松动并不意味着联盟本身的失效。事实上，如果从整体视角来观察美国联盟体系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动态变化，可以清楚地发现，美国联盟体系不仅没有像现实主义学者所预测的那样进行收缩，反而在不断扩张。冷战结束后的头20年间，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联盟均在缓慢扩张。在欧洲地区，北约自1993年开始计划东扩，在2010年之前完成了三轮东扩，共吸收了12个新成员；此外，北约的安全任务也由传统的集体防御延伸到危机管理，频繁在联盟防区之外执行北约“第五条 集体防御条款”之外的任务。在亚洲地区，美日联盟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走向扩张，由注重本土防御上升至关注周边安全事态，最终确定为全球性联盟；美韩联盟也在21世纪初由注重半岛防御扩张至关注地区安全事务。

近十年以来，伴随着全球性大国竞争的回归，美国联盟体系进入了快速扩张的阶段。自2017年和2020年相继接收黑山和北马其顿后，作为美国联盟体系核心的北约以2022年6月马德里峰会为标志，开启了新一轮的扩张进程：一方面，北约接收了芬兰和瑞典两个传统中立国，将地理界限向北推进；另一方面，北约新版战略概念文件将中国列为与俄罗斯同等重要的竞争对手^②，意味着北约的触手逐渐伸向了亚太地区。美国的亚洲联盟体系随着2010年以来中国崛起进程的加速也出现了扩张的动向。有学者提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安全合作布局正在由以往的“轴辐”形态转向“网络式”安全架构，具体表现为美国与其地区盟友和安全伙伴建立了广泛的双边、少边和多边防务安排。^③

^① 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1993, pp. 44 - 79;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1990, pp. 5 - 56.

^② NATO,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June 29, 2022.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2/6/pdf/290622-strategic-concept.pdf. [2024-04-07]

^③ Matteo Dian and Hugo Meijer, “Networking Hegemony: Alliance Dynamics in East Asi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7, No. 2, 2020, pp. 131 - 149.

对于不对称联盟来说，联盟主导国的战略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联盟议程。换言之，美国联盟体系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持续扩张主要是因为美国需要借助庞大的联盟体系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最近十年间，美国综合实力的相对衰弱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不断崛起，使得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对立态势愈发明晰，联盟对美国的战略意义也更为重要，美国联盟体系在这一时期的扩张可以用传统的权力制衡逻辑进行解释；而在后冷战时代的头 20 年，美国的综合实力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并不存在明确的竞争对手，但却仍然致力于扩张联盟。如何解释美国联盟体系在大国竞争回归之前的扩张？两个阶段的扩张之间又存在什么联系？本文旨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本文提出，美国推动联盟体系扩张的根本目的是实现霸权护持，但在不同阶段遵循不同的逻辑：在霸权维持阶段，美国在权力和地位上掌握绝对优势，由于不面临明确的竞争对手，美国霸权的主要挑战来自于潜在对手的崛起压力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美国需要通过联盟体系扩张来制衡这些安全风险；进入霸权转移阶段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已经确定，崛起国成为霸权的主要挑战，美国不得不通过联盟体系扩张来制衡崛起国不断提升的权力。霸权维持阶段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霸权转移阶段的扩张动力。

一 概念界定：联盟体系扩张

联盟体系是指国家在同一时期参与的不同联盟的总和。只有当某个国家同时具备不同联盟（双边联盟或多边联盟）的成员身份时，这些联盟才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联盟体系。由于相对实力的差距，国家在不同联盟中的角色和地位可能存在差异，对不同联盟的塑造能力也各不相同。一般而言，相比在多数联盟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在多数联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具备更强大的塑造联盟体系的能力。

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在维持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① 广义上看，美国的联盟体系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简称北约），这是美国联盟体系的核心所在，也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

^① 刘丰：《联盟与国际秩序》，载《当代美国评论》，2019 年第 3 期，第 12 - 18 页。

持力量，除美国外目前共有 31 个成员。二是亚洲地区的“轴辐体系”，即美国分别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 5 个国家构建的双边联盟。实际上，美国与巴基斯坦于 1959 年签署的联盟协议仍在生效，但两国之间的联盟关系事实上已经破裂，巴基斯坦在美国联盟体系中的角色已不重要，因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主要依靠以上 5 个盟国展开。三是《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又称《里约条约》），这是部分美洲国家组织成员间签署的联盟条约，除美国外目前共有 18 个成员。^① 四是美国授予“非北约重要盟友”地位但并没有签订正式联盟条约的国家，包括埃及、以色列、约旦、新西兰、巴林、科威特、摩洛哥、突尼斯和卡塔尔。这些国家与美国之间虽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互助义务，但存在较高水平的安全合作关系。^②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还曾对一些盟友授予“非北约重要盟友”地位，包括澳大利亚、日本、韩国、阿根廷、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巴西和哥伦比亚，以彰显它们对美国的重要战略意义。

本文将联盟体系扩张区分为两种具体的类型。一是联盟扩张，即联盟体系的分支在成员规模或议题内容上的扩大。联盟体系由同一国家参与的不同联盟共同组成，某一支联盟的扩张也意味着整个联盟体系的扩张。本文对联盟扩张的判断关注成员规模和议题内容两个指标。成员规模相对而言较为直观，新成员加入后，联盟的防区范围将扩展至新成员的领土上，相比此前明显实现了扩大。议题内容则需要与联盟条约进行对照，一般而言，联盟仅涉及安全领域的合作，并且联盟条约会对合作范围作出具体的地理空间限制，通常是所有成员国的领土范围，如《北大西洋公约》第六条对北约集体防御的区域范围作了明确的界定，包括欧洲或北美洲任何缔约国的领土、法属阿尔及利亚、欧洲任何缔约国的占领军队、北回归线以北的北大西洋区域任何缔约国所辖岛屿，以及该区域内任何缔约国的船舶或飞机。^③ 当联盟成员间的实际合作内容超出了条约所限定的功能领域范围和地理空间范围，本文则认为该联盟进行了扩张。需要注意的是，联盟议题内容的扩张除了受主导国战略规划的影响外，也与国际体系的整体环境相关：一方面，在复合相互依赖

^①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Inter - American Treaty of Reciprocal Assistance (Rio Treaty)”, September 2, 1947. <https://www.oas.org/juridico/english/signs/b-29.html>. [2024 - 04 - 07]

^② 刘丰：《秩序主导、内部纷争与美国联盟体系转型》，载《外交评论》，2021年第6期，第27页。

^③ NATO,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April 4, 1949.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7120.htm. [2024 - 04 - 07]

的时代，议题之间广泛联系^①，导致安全边界不断扩大，许多非安全议题被“安全化”^②；另一方面，时代的发展也催生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兴安全议题，如恐怖主义和网络安全等。鉴于联盟的核心功能是提供安全保障，这些体系性的变化都会推动联盟实现议题内容上的扩张。

二是联盟联结，即在不同分支联盟之间建立对话与合作机制。联盟体系由同一国家与不同国家之间的联盟共同组成，除联盟体系主导国外，其他国家不存在安全上的义务。例如，日本和韩国同为美国的盟友，但两国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联盟关系，车维德（Victor Cha）将这种关系界定为“准联盟”^③。对联盟体系主导国来说，如果能在不同盟友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甚至将多个双边联盟合并为一个多边联盟，那么联盟体系的工具效用将得到增强。一方面，不论是多边合作机制还是多边联盟，都能为该国在政治和军事上提供更强大的支持力量，进而有助于更好地应对竞争对手的挑战；另一方面，多边合作的形成也有助于衍生出新的合作内容，扩展原有的双边合作范围，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联盟议题内容的扩大。考虑到多边联盟本身就有多个成员国，涉及多边联盟的联盟联结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多边联盟作为一个整体与联盟体系的其他分支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另一种是多边联盟的部分成员在联盟体系主导国家的协调下与其他分支联盟建立新的安全合作关系。当然，联盟联结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联盟体系主导国对不同联盟的管理能力，特别是对盟友的谈判能力。^④

联盟扩张与联盟联结在概念上区别于联盟转型和联盟强化。凌胜利指出，联盟存在核心变量、重要变量、次要变量三类指标，只有核心变量的变化能够带来联盟转型，这些变量包括联盟性质、联盟内容、联盟职能、联盟结构和联盟形式。其中，联盟内容的变化包括由军事安全和传统安全延伸至综合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本文将这种变化界定为联盟扩张；联盟形式的变化包括由双边联盟转变为多边联盟，这种现象在本文中被描述为联盟联结。此外，

^①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Longman, 2012, pp. 20 - 24.

^② Ole Wæ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onnie Lipschutz (ed.), *On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6 - 86.

^③ Victor D. Cha, "Abandonment, Entrapment, and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Asia: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Korea",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4, No. 2, 2000, pp. 261 - 291.

^④ 黄宇兴：《谈判能力与联盟转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第77-101页。

次要变量中的联盟区域也涵盖在本文界定的联盟扩张中。^① 联盟强化既包括合作程度的提升，也包括合作范围的延展，联盟扩张与联盟联结更多指涉后者。

二 风险制衡、权力制衡与霸权护持

本文假定，霸权护持是美国推动联盟体系扩张的核心动力。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体系也进入了美国主导的单极时代。^② 由于霸权地位能使美国享有不受约束的行动自由^③，有助于更广泛地实现和扩大国家利益，因此维持霸权地位是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首要战略目标，这在美国历任总统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均有所体现。而霸权地位的稳固性和持久性则取决于美国能否有效化解外部挑战。

（一）安全风险、权力优势与霸权挑战

关于联盟因何形成，国际关系学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即权力制衡论^④、威胁制衡论^⑤和利益制衡论^⑥。这三种解释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即认为国家建立联盟的前提是存在明确的外部威胁，只是对威胁的来源存在不同的判断。由于学者们倾向于将联盟视为制衡威胁的手段，因此传统的联盟文献往往将研究背景设定为大国竞争时期。而冷战结束之初，大国竞争已不复存在，即使其他所有国家联合起来，也无力挑战美国的实力和地位。^⑦ 正因如此，一些学界和政策界人士才预测美国联盟体系将收缩甚至瓦解^⑧，但现实情况却与此截然不同。关于北约的存续与扩张，现有研究从北约的制度属性、成员国共享的价值理念、美国维持霸权的需要三个角度进行了解释。^⑨ 然而，前两种角

① 凌胜利：《联盟的转型：一项概念分析》，载《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3期，第11-20页。

②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in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1, 1991, pp. 23-33.

③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in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2009, pp. 94-95.

④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Chapter 6.

⑤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ter 2.

⑥ Randal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 72-107.

⑦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1999, pp. 9-22.

⑧ 宋芳：《“北约过时论”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意涵》，载《国际观察》，2020年第3期，第134-136页。

⑨ 魏冰、刘丰：《威胁认知、安全供给与北约扩张的逻辑》，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5期，第21-23页。

度无法解释北约的扩张进程，并且无法适用于美国的亚洲联盟体系；后一种角度则没有具体揭示美国如何依靠联盟体系扩张来维持霸权。本文提出，尽管其他国家在冷战结束之初缺乏挑战美国的能力和意愿，但美国的霸权地位仍然可能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冲击，这种安全风险也是美国进行霸权护持时所要应对的。

西莱斯特·沃兰德和罗伯特·基欧汉在讨论广义安全制度的功能时区分了威胁（threat）和风险（risk）两个概念。威胁指的是一种确定的安全挑战，当某个国家认为另一个国家企图对其发动进攻，或出于政治原因而威胁使用军事力量时，该国就面临威胁。而风险指的是一种不确定的安全挑战，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来自于不稳定的安全局势、不完全的信息、不完善的安全规则等。^① 传统联盟理论主要关注威胁，忽视联盟应对风险的作用。事实上，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国家在任何时候都面临安全风险，并且，安全风险往往难以消除，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战略安排来尽可能缓解。例如，对冲战略就是中小国家缓解安全风险的一种重要手段。^② 此外，风险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转化为威胁。一个直观的案例是，冷战结束之初，考虑到俄罗斯（苏联）转型失败的可能，美国在当时仍然将其定位为安全风险；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美国明确将俄罗斯认定为安全威胁。^③ 对于霸权国来说，即使不面临特定的安全威胁，一些不确定的安全风险仍然可能构成对霸权地位的挑战。要想确保霸权地位的稳固与持久，霸权国既需要制衡安全风险，同时也要预防这种风险在未来转化为威胁。

根据斯蒂芬·沃尔特的界定，国家对于安全威胁的认知和判断由对手的综合实力、地理毗邻性、进攻性实力和进攻性意图共同决定。^④ 这些因素显然具有一般性和普适性，尤其符合中小国家的认知模式，但对于霸权国而言，对手的综合实力在其威胁认知过程中无疑具有优先性。正如进攻性现实主义

^① Celeste A. Wallander and Robert O. Keohane, "Risk, Threat, and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Helga Haftendorn, et al. (eds.),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1–22. 沃兰德在另一项研究中讨论了“威胁评估”和“风险评估”对国家安全战略的不同意义，参见 Celeste A. Wallander, *Mortal Friends, Best Enemies: German–Russian Cooper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ter 3.

^② 史田一：《地区风险与东盟国家对冲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第74–102页。

^③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2017. <https://history.defense.gov/Portals/70/Documents/nss>. [2024–04–08]

^④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ter 2.

理论所预设的，霸权是确保国家安全的最理想方式，而霸权建立在权力优势基础上。^① 当权力优势足够明显和稳定时，霸权国处于一种绝对安全的状态，其国家利益也能得到充分保障；而当权力优势因崛起国的不断发展而缩小时，霸权国即使不存在被攻击的可能，其对于自身安全程度的认知也会下降。当这种情况出现时，霸权国会把崛起国塑造为自身的安全威胁，并采取措施削弱对手权力或提升己方权力以维持权力优势，进而确保霸权地位的稳固。此外，霸权国的国内发展与其霸权地位紧密相连，霸权地位受到挑战不仅会影响霸权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威望，也会损害其发展利益，这为霸权国在权力优势缩小时进行霸权护持提供了额外的动力。

（二）联盟体系扩张与霸权护持的逻辑

理论上，霸权秩序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② 第一阶段是霸权维持，即霸权国正式确立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后，在与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维持霸权地位。霸权通常是在体系战争或大国崩溃之后形成的，刚刚确立的霸权国往往在综合实力上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因此这一阶段的霸权地位最为稳固。但与此同时，霸权国的实力也会因维持霸权的成本而逐渐衰退，新兴国家则会因后发优势而飞速发展，双方的国内政治变化及互动进程将决定霸权维持阶段的时间长度。第二阶段是霸权转移，即新兴国家崛起到一定程度后寻求调整国际利益格局，引发霸权秩序的转型。^③ 这一阶段霸权国的霸权地位开始面临明显的挑战，由于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权力差距逐渐缩小，崛起国取代霸权地位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双方的竞争关系得到了正式的确立。而旧的霸权秩序能否得以维持、新的秩序会否出现，则取决于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竞争结果。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阶段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而是随霸权国与崛起国的竞争强度变化而逐渐过渡。

霸权国在两个阶段都需要护持霸权，但具体方式随霸权挑战的不同而存

^①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Chapter 2.

^② 克里斯托弗·蔡斯—邓恩 (Christopher Chase - Dunn) 和理查德·鲁宾森 (Richard Rubinson) 将霸权区分为单中心时期和多中心时期两个阶段，前者指由一个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时期，后者指霸权国力量开始衰退而其竞争对手力量开始上升的时期。本文借鉴并修正了这种划分方式，参见 Christopher Chase - Dunn and Richard Rubinson, "Cycles, Trends and New Departures", in John W. Meyer and Michael T. Hannan (ed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System: Educ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1950 - 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p. 278 - 280.

^③ 刘丰：《国际利益格局调整与国际秩序转型》，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5期，第46-62页。

在差异。在第一阶段，霸权国享有绝对的权力优势，其他国家既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主动发起挑战。换言之，霸权国在这一阶段是国际体系中最安全的国家，尽管可能出于国内政治等原因而夸大外部威胁，但其实际上并不面临安全威胁。然而，霸权国的地位仍然可能受到两类安全风险的挑战。

一是潜在对手的崛起压力。可以确定的是，任何霸权秩序都不可能得到所有国家的认可与支持，国际体系中始终会存在不被霸权国视为伙伴的国家。这些国家也许在现阶段没有明确挑战霸权，但基于制度属性和价值理念等因素的差异性，霸权国会将这些国家视为潜在对手，尤其是那些历史上曾是大国的非伙伴国家。一旦这些国家成功实现崛起，将对霸权国的安全构成重大挑战，并引起其对霸权地位的焦虑。^① 因此，潜在对手的崛起压力构成了霸权国所面临的安全风险，为了尽可能维持霸权地位的稳固并延长霸权地位的时间，霸权国需要在风险尚未转变为实际威胁时就进行预防。霸权国可以采取两种手段制衡这类安全风险。第一，削弱潜在对手未来发起挑战的意愿，这种手段一旦成功，将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维持霸权地位的稳固。实施这种手段的本质则在于将潜在对手转变为霸权国的伙伴。正如亚历山大·温特所言，对美国来说，英国500枚核武器的威胁性不如朝鲜的5枚核武器，因为美国与英国共享身份认同，而朝鲜被美国视为“他者”。^② 如果霸权国能在霸权维持阶段与潜在对手发展出共同的身份，那么将部分消除其霸权地位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霸权地位也将更为持久。当然，由于身份转变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因此这种手段的效果也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第二，提前为未来可能的挑战进行准备。即使潜在对手无法成为霸权国的伙伴，但其转变成霸权国的实际对手仍需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霸权国可以抓住这段时间提前进行准备，以便在未来可能的对抗中占据先机。

二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全球化的演进使得安全的范围不断延展，一些被传统安全研究所忽略的问题，如族群冲突、恐怖主义等，也越来越成为破坏国际秩序稳定的因素。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主体多层次性、多元性、突发性与扩散性、跨国性等特征^③，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霸权国的安全

^① 韦宗友：《地位焦虑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载《国际观察》，2022年第3期，第75-78页。

^②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55.

^③ 俞正梁著：《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21世纪国际关系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6-147页。

风险，而制衡这类风险的最佳手段就是从源头上消除其带来的不利后果。联盟无疑是霸权国制衡风险的重要工具，通过推动联盟体系扩张，霸权国能够同时寻求将潜在对手发展为伙伴和为潜在对手的未来挑战进行提前准备，并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第一，霸权国可以选择将潜在对手吸收进自己主导的联盟体系中，以增强双方的身份认同。方松英等人的研究表明，联盟除了向成员国提供安全保障外，还具备约束盟友的功能。^① 帕特里西亚·韦茨曼和杰瑞米·普莱斯曼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国家建立联盟的初衷可能就是为了约束对方的行为。^② 也就是说，霸权国可以通过与潜在对手结成联盟，来强化对其行为的约束，进而缓解其挑战自身霸权的意愿。与此同时，联盟合作本身也有助于增进盟友之间的信任。^③ 第二，霸权国可以通过扩大议题内容或增加新成员来占据战略上的有利地位，以削弱潜在对手未来发起挑战的能力，并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一方面，扩大议题内容可以强化霸权国的战略部署，以在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和功能领域范围内应对潜在对手可能带来的挑战，并有助于及时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另一方面，霸权国可以通过扩大联盟成员规模，尤其是将对潜在对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吸收进联盟体系，以此发展针对潜在对手的战略空间。第三，霸权国可以通过联盟联结来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考虑到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独特性质，将不同地区盟友的力量联合起来既能降低霸权国护持霸权的成本，同时也能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

进入第二阶段后，霸权国的权力优势逐渐缩小，在崛起国不断要求调整国际利益格局的情况下，双方的竞争与对抗态势已然明确，崛起国也将被霸权国视为安全威胁。这一阶段的霸权护持将遵循传统的权力制衡逻辑，霸权国将充分借助联盟体系的力量，有针对性地采取制衡手段，以防止权力格局朝着对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进而维持其霸权地位。联盟扩张和联盟联结在这一阶段都适用。联盟新成员的加入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新联盟的形成，正如传统联盟理论表明的，国家建立联盟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制衡对手权力；

^① Songying Fang, Jesse C. Johnson, and Brett Ashley Leeds, "To Concede or to Resist?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Military Alliance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8, No. 4, 2014, pp. 775 - 809.

^② Patricia A. Weitsman, *Dangerous Alliances: Proponents of Peace, Weapons of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Jeremy Pressman, *Warring Friends: Alliance Re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 Kyle J. Wolfley, "Military Statecraft and the Use of Multinational Exercises in World Politics",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7, No. 2, 2021, pp. 1 - 24.

如果崛起国的挑战不局限于安全领域，那么霸权国也可以选择将联盟合作扩展到安全之外的功能领域，以直接应对崛起国的挑战；而联盟联结的本质是充分团结各个盟友的力量，既有助于降低霸权国的联盟成本，又能强化对对手的相对权力。

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是，由于霸权国的权力优势缩小，其对联盟体系的管理能力可能随之下降。霸权国是联盟安全保障能力的主要供应者，霸权国的权力衰退将削弱联盟的威慑能力，加重盟友“被抛弃”的担忧，从而促使它们寻求其他形式的安全保障。^① 这将强化联盟内部的离心力，从而阻碍联盟体系扩张。然而，霸权国权力相对衰退的另一个侧面是崛起国权力的相对增长以及不断提升的调整国际利益格局的诉求，考虑到霸权国盟友是现有霸权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崛起国对霸权秩序的挑战某种意义上也会加剧它们的威胁认知，进而鼓励其与霸权国进行更紧密的捆绑。换句话说，在这一阶段，霸权国盟友或许会通过发展军备或其他形式的安全合作关系来加强自身安全，但其对联盟的支持不会出现重大改变，两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相互排斥。

图1展示了霸权国通过联盟体系扩张实现霸权护持的逻辑。在霸权维持阶段，霸权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潜在对手的崛起压力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霸权国可以通过联盟扩张和联盟联结来制衡这些安全风险，从而护持霸权。在霸权转移阶段，权力优势的缩小使霸权国将崛起国塑造成对自身的安全威胁，由于双方已经出现了明确的竞争关系，霸权国可以通过联盟扩张和联盟联结的方式对崛起国进行权力制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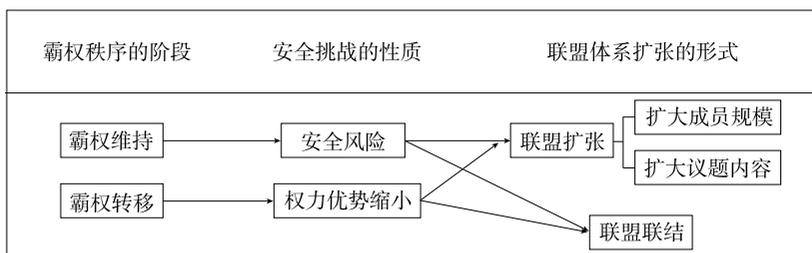


图1 联盟体系扩张与霸权护持的逻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Brian Blankenship, “Promises under Pressure: Statements of Reassurance in US Alliance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4, No. 4, 2020, p. 1020.

虽然两个阶段的联盟体系扩张由不同的逻辑支撑，但两者并非没有联系。基于两点原因，霸权维持阶段的扩张为霸权转移阶段的扩张提供了部分动力。第一，为了提升与潜在对手之间的身份认同，霸权国可能以联盟为平台加强双边合作，甚至寻求将潜在对手纳入其联盟体系。在这一过程中，霸权国为潜在对手提供了充足的发展时间和空间，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潜在对手的实力。第二，为了预防潜在对手未来可能的挑战，霸权国也会试图将对潜在对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吸收进其联盟体系中，或者有针对性地扩大联盟的议题内容。而联盟体系的扩张一旦触及潜在对手的周边地区乃至领土范围，显然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一举措将引发双方的安全困境，最终将潜在对手转变为真正的对手。简单来说，霸权国为应对来自于潜在对手的可能挑战而采取的联盟体系扩张行为，既为潜在对手的权力提升提供了机遇，同时又强化了双方的竞争立场。在这个意义上，霸权国的联盟体系扩张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不仅为自己制造了强大的对手，也为霸权秩序的转型提供了内在的动力。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尽管霸权护持主要是霸权国的战略需求，但正如前文所言，霸权国盟友同样是霸权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它们也能从稳固的霸权秩序中获益。一方面，稳定的霸权秩序意味着霸权国有充足的力量为其盟友提供安全保障，从而增强后者的安全预期；另一方面，霸权地位所附带的责任是提供公共产品^①，霸权地位越稳固，霸权国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就越强，其盟友从中获得的利益也就会越多。从这个角度来说，霸权国的盟友自然也具备协助霸权国进行联盟体系扩张的动力。此外，霸权国的盟友本身也可能受到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霸权国潜在对手带来的安全挑战，这也进一步提升了它们的合作意愿。

三 冷战后的美国联盟体系扩张

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美洲和中东四个地区。其中，美洲地区的联盟是以《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为基础的多边联盟，该条约签署的主要目的是管理成员之间的内部冲突，而非提供区域防御以应对外

^①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2, 1981, pp. 242–254.

部威胁。^① 美洲地区长期以来也被美国视为其“后院”，迈克尔·马斯坦杜诺将该地区的秩序界定为美国主导的帝国秩序^②，可见美国在美洲地区享有不受挑战的主导地位。除此之外，冷战结束以来，美洲地区并不面临外来安全挑战，而更多是内部的安全问题，这一联盟的近几次合作也主要是为了应对地区危机^③，这些问题对美国的霸权地位不会构成挑战。因此，不论是在霸权维持阶段还是霸权转移阶段，美国自身及其地区盟友都不具备推动《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进行联盟扩张或与美国其他地区联盟进行联结的动力。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联盟则主要以“非北约重要盟友”的形式存在，考虑到这种联盟形式没有联盟条约的保障，无法对联盟扩张做出准确的判断，因此本文对美国中东联盟体系的考察主要关注其是否进行联盟联结。而欧洲和亚洲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霸权面临挑战的主要地区，美国联盟体系扩张也在这两个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北约的扩张进程

在1989年12月的马耳他会议上，美苏两国正式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以此为起点，北约也开启了转型之路，并于1990年发布《北大西洋联盟转型宣言》。北约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迅速计划转型，一个重要的现实背景是，虽然苏联的威胁大大缓解，但东欧剧变带来的安全风险仍然构成了地区安全的重要挑战。正如1991年版北约战略概念文件中所言，“联盟所面临的安全风险不太可能来自于对成员国领土的蓄意侵略，而更可能来自于许多中东欧国家面临的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包括族群冲突、领土争端等，所带来的不稳定”^④。与此同时，俄罗斯（苏联）的国内政治转型进程仍然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对美国来说，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可能在将来重新成为修正主义力量。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在1994年曾明确表示，“俄罗斯可能在经过动乱之后成为同西方敌对的一个极权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

^① Tom Long, “Historical Antecedents and Post - World War II Regionalism in the Americas”, in *World Politics*, Vol. 72, No. 2, 2020, pp. 214 - 253.

^② Michael Mastanduno, “Partner Politics: Russia, China, and the Challenge of Extending US Hegemony after the Cold War”,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28, No. 3, p. 454.

^③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The Inter - American Treaty of Reciprocal Assistance and the Crisis in Venezuela”, December 11, 2019.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N/IN11116>. [2024 - 04 - 09]

^④ NATO, “The Alliance’s New Strategic Concept”, November 1991.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3847.htm. [2024 - 04 - 09]

义的国家”^①。

为了制衡安全风险，美国在两个方向上积极推动北约进行扩张。第一，扩大议题内容，强化危机管理。由于成员国的安全风险主要来自于中东欧国家国内不稳定所带来的地区性危机，《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规定的集体防御使命已经无法确保成员国的安全。在此背景下，北约将其安全任务延伸至危机管理，强调通过预防性外交和成功的危机管理来维护地区和平。^② 而地区危机的爆发地点不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第六条规定的防御范围，因此执行危机管理行动意味着北约安全议题的地理空间得到扩张。第二，扩大成员规模，推动联盟东扩。关于北约东扩的政策背景，学界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整体而言，北约希望通过东扩来加速中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并防范俄罗斯可能的重新扩张。^③ 实际上，除了吸收中东欧国家外，北约也在积极与俄罗斯接近。1996年5月，俄罗斯正式加入“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并与北约签署了《双边军事合作计划》。1997年5月，双方还就建立常设联合理事会达成一致，并于2002年5月正式建立了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持续的接近甚至使俄罗斯萌生过加入北约的想法。^④

“9·11”事件爆发后，恐怖主义成为美欧国家面临的首要安全挑战。由于恐怖袭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分散性特征，国家难以在终端进行预防，在此背景下，北约进一步将其行动空间扩展至全球，试图通过打击恐怖组织的基地从根源上消除恐怖主义。2010年版北约战略概念文件指出，“北约边界以外的危机和冲突可能对联盟领土和人民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管理冲突的最佳方法是防止它们发生”^⑤。与此同时，随着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北约也加强了网络防御能力建设^⑥，进一步拓展了联盟的议题内容。

此外，北约东扩的进程也在持续推进。自1999年接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后，北约又在2002年吸纳了7个中东欧国家，并在2008年4月邀请阿尔巴

^① 刘靖华、牛军、姜毅：《论北约东扩——地缘政治与文明特性的双重分析》，载《美国研究》，1997年第3期，第64页。

^② NATO, “The Alliance’s New Strategic Concept”, November 1991.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3847.htm. [2024-04-09]

^③ 李海东：《克林顿政府与北约东扩》，载《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第54-69页。

^④ Jamestown Foundation, “Putin Says Russia could Join NATO”, March 6, 2000.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putin-suggests-russia-could-join-nato/>. [2024-04-09]

^⑤ NATO, “Active Engagement, Modern Defence”, November 19, 2010.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68580.htm. [2024-04-10]

^⑥ 毛雨：《北约网络安全战略及其启示》，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4期，第104-121页。

尼亚和克罗地亚加入，这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不满。俄罗斯的愤怒最终通过 2008 年 8 月的俄格战争表现出来，北约成员国对领土入侵威胁的担忧也自此开始回归。直到 2014 年 3 月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对抗关系正式确定。2014 年 9 月北约《威尔士宣言》明确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一系列侵略行为使北约面临严重的危机。^① 为了强化对俄罗斯的权力制衡，北约在威尔士峰会上通过了“准备行动计划”，对北约集体防御能力进行了后冷战时代的最大加强。北约还分别在 2017 年和 2020 年接收了黑山和北马其顿两个新成员，进一步强化了对俄罗斯的前线防御。

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和俄罗斯的对抗到达了新的高峰。北约 2022 年版战略概念文件指出，“我们不能排除联盟成员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受挑战的可能性”^②。这就意味着，在北约看来，当前俄罗斯构成的威胁已经趋近于冷战时期的苏联。面对俄罗斯的入侵威胁，芬兰和瑞典两个传统中立国迅速申请并分别于 2023 年和 2024 年顺利加入了北约，双方的相互接近符合传统的权力制衡逻辑。在美国继续推动强化北约军事能力建设和“泛安全化”转型的背景下^③，可以预见未来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将愈发加剧。

（二）亚洲联盟体系的扩张进程

相比北约的迅速转型，美国亚洲联盟体系在冷战结束之初曾一度陷入停滞，这与亚洲当时的地区安全环境差异密切相关。苏联解体后，美国及其亚洲盟友的共同对手不复存在，而中国崛起和朝核问题等尚未对地区安全局势构成重要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安全问题在整个“轴辐”联盟体系中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再加上联盟内部在其他议题上的矛盾，如美菲在军事基地问题上的冲突，美日、美韩和美泰在贸易问题上的摩擦等，美国在亚洲的双边联盟普遍陷入了一段短暂的“漂流期”。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美国亚洲联盟体系的扩张进程开始起步，尤其以美日联盟最为典型。1994 年，时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提出，美国政府应当重视日本战略价值，重新审视美日联盟关系。在奈的主持下，

^① NATO, “The Wales Declaration on the Transatlantic Bond”, September 5, 2014.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12985.htm. [2024-04-10]

^② NATO,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June 29, 2022.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2/6/pdf/290622-strategic-concept.pdf. [2024-04-11]

^③ 徐若杰：《维尔纽斯峰会与北约在新阶段的战略重点》，载《世界知识》，2023 年第 15 期，第 44-46 页。

美日双方于1994—1996年间就联盟关系的未来进行了多次审议，强有力地推动了美日联盟的复兴。^①1996年克林顿访问日本期间，双方共同发布了《美日安全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联盟》，表示美日联盟“在21世纪仍然是实现共同安全目标、维护亚太地区稳定繁荣环境的基石”^②。自此以后，美日联盟得到明显强化并逐渐走向扩张。1997年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对联盟的适用范围进行了第一次调整，将美日联盟由“专守防卫”调整为应对“周边事态”^③，意味着联盟将针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动态进行战略布局；2005年《美日联盟：面向未来的转型与重组》文件再度调整联盟适用范围，指出美日双方将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④，这也标志着美日联盟的全球属性正式确立。至此，美日联盟的议题内容已经由日本本土防御扩展至应对全球范围内的安全挑战。

其他四组联盟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强化和扩张。美韩联盟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低潮期后，自“9·11”事件后开始不断强化，并在2006年就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问题达成一致，标志着美韩联盟的定位由“固守半岛的联盟”转向“地区联盟”^⑤；菲律宾在1995年美济礁事件后主动寻求重启与美国的联盟关系，进入21世纪后积极配合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美泰联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经受了严重的挑战，“9·11”事件后，美国积极拉拢泰国支持其反恐行动，由此推动了联盟关系的缓和与强化；美澳联盟同样因美国的反恐行动而得到提升，其重心甚至由亚太地区偏向于南亚和中东地区。^⑥

可以看到，美菲、美泰和美澳联盟的强化与扩张主要与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相关，这与北约在21世纪初的“全球化”进程遵循同样的逻辑，旨在应

① 陶文钊：《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载《美国研究》，2015年第4期，第13页。

②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 - U. S.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April 17, 1996. <https://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security/security.html>. [2024 - 04 - 12]

③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The Guidelines for Japan - U. S. Defense Cooperation”, September 23, 1997. <https://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security/guideline2.html>. [2024 - 04 - 13]

④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U. S. - Japan Alliance: Transformation and Realignment for the Future”, October 29, 2005. <https://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security/scc/doc0510.html>. [2024 - 04 - 13]

⑤ 李军：《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内涵及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4期，第50 - 54页。

⑥ 喻常森：《21世纪美澳同盟再定义：从联合反恐到应对中国崛起》，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第77 - 81页。

对恐怖主义势力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带来的风险。美韩联盟的扩张除了配合美国全球军事战略调整的需要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期望加强韩国在预防地区性大国崛起和维护核不扩散机制等方面的作用。^①而作为“轴辐”联盟体系的核心，美日联盟的扩张同样源于美国霸权护持的需要。

根据美国国防部1990年和1992年发布的两份战略报告，美国原本计划在整个90年代持续推进在亚太地区的撤军。然而，1993年朝鲜试射导弹和1995年“台海危机”等一系列安全问题的发生使美国意识到，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前景不容乐观。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第三份《美国东亚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亚洲仍然是充满不确定性、局势紧张和军事力量高度集中的地区，许多军事强国都位于亚太地区，包括那些有核国家，这意味着亚太地区的安全冲突会给整个国际体系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美国决定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②1998年的战略报告对亚太地区安全局势进行了更全面的描绘，也更详细地阐释了美国的地区战略安排，表示美国将综合采取接触、海外军事存在和强化联盟等政策手段来消除地区不稳定的根源。^③

对美国来说，中国在亚洲地区安全议题中无疑具有优先性。作为领土面积排名世界第三的国家，中国的存在本身就是地区安全格局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在经济发展的拉动下，中国的国防建设也加快了脚步：一方面，中国的国防预算不断增加，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每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另一方面，中国也对武装力量进行全面重组，接连从俄罗斯等国购入先进武器装备。但从总量来看，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在当时显然远不及美国，特别是军事实力。根据美国国防部200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尽管中国正在加快武装部队的现代化进程，但其在武器和训练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缺陷，在较长的时间内，中国都无法对美国构成挑战。^④然而，站在美国的角度，虽然中国一直表示其军事力量建设是出于防御性目的，但

① 凌胜利：《联盟信任变迁与美韩联盟转型》，载《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4期，第45页。

②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 – Pacific Region”, February 1995. <https://apps.dtic.mil/sti/pdfs/ADA298441.pdf>. [2024-04-14]

③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 – Pacific Region”, 1998. <https://ryukyu-okinawa.net/downloads/usdod-east98.pdf>. [2024-04-14]

④ 李志东：《美国人看中国的军事力量与安全战略》，载《国际论坛》，2001年第3期，第15页。

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中国长期的战略目标并不确定。再加上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都与美国选定朋友的标准不符^①，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在未来可能演变为对美国地区乃至全球霸权的挑战。换句话说，中国在当时被美国视为其霸权所面临的安全风险。

为了制衡风险，美国主要采取了两种行动。第一，推动美日联盟扩大议题内容。冷战结束后，日本领土遭受第三方行为体进攻的可能性明显下降，双方的安全挑战更多来自于地区层次的安全风险。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双方才在1997年将联盟的定位调整为应对周边安全事态。而关于风险的具体来源，2000年10月美国第一份《阿米蒂奇报告》指出，美国和日本在亚洲都面临着不确定的安全环境，中国和俄罗斯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以及朝鲜半岛缓和局势的脆弱性，都表明美日联盟亟待提升。^②这份报告也为小布什政府时期美日联盟的扩张提供了方向。2004年12月，日本防卫厅发布《防卫计划大纲》，明确表示中国是引起日本安全担忧的不确定、不透明因素。^③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配合美国全球反恐战略的需要，共同推动了美日联盟在2005年继续将联盟的议题内容扩大至全球层次。2007年美国第二份《阿米蒂奇报告》再度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和发展将确保中国的实力和富裕，但其发展方向仍然悬而未决^④，这就意味着美国持续将中国视为安全风险。第二，寻求从内部改造中国。冷战结束后的较长时间内，美国都对美国实施“接触”战略，试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多个方面塑造和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⑤对美国来说，只有将中国改造为与自己具有更高同质性的国家，才能更有效地消除中国给美国带来的安全风险。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主要采用了双边形式，相比多边联盟，双边联盟增加成员会对联盟的整体制度安排

① 邢悦：《文化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86-92页。

②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dvancing Toward a Mature Partnership”, October 11, 2000. http://spfusa.org/wp-content/uploads/2015/11/ArmitageNyeReport_2000.pdf. [2024-04-15]

③ 朱凤岚：《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载《国际论坛》，2005年第5期，第13页。

④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The U. S. - Japan Alliance: 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 February 2007.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media/csis/pubs/070216_asia2020.pdf. [2024-04-16]

⑤ 达巍：《告别“接触”，美国对华战略走向何方》，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16期，第23-25页。

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导致成员之间更难达成共识，因此美国没有考虑过将中国吸收进其联盟体系。

事实证明，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美国试图影响中国内政的行为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及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相对衰退，美国的权力优势逐渐缩小，美国对于中国的威胁认知随之上升。2011年，美国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姿态也正式确立并逐渐升级。除了利用“贸易战”等单边行动制裁中国，以及强化与其盟友之间的双边安全合作外，美国还采取了两种联盟体系扩张的手段。一是在亚洲盟友之间进行联盟联结。美国试图将“轴辐”联盟体系转型为“网络式”地区安全架构，以期联合地区盟友和安全伙伴的力量共同围堵中国^①，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启动美日印澳四边对话机制（QUAD）。事实上，这一机制早在2006年就由日本率先提出，但当时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重新启动并升级了这一四边对话机制，旨在制衡中国的地区性崛起；拜登政府时期，四边对话机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联结并非仅针对条约盟友，一些重要的安全伙伴也被纳入在内，包括印度、新西兰和一些东南亚国家。二是将联盟合作的议题内容扩展到经济领域。与冷战时期的苏联不同，中国与美国的竞争不仅出现在安全领域，而且存在于经济领域，甚至经济领域的竞争更为激烈。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提升了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尤其是，中国大力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许多地区国家的支持和参与，这对美国长期以来的地区霸权构成了明显的挑战。为了确保地区经济秩序的主导权，美国联合其地区盟友和伙伴在经济领域加强了对中国的打压。一方面，美国积极组建技术联合，寻求在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推动中国与地区国家的脱钩，并强化在技术领域对中国的竞争优势^②；另一方面，在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宣布不会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情况下，美国于2021年宣布推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试图借此进一步深化与地区盟友

^① Matteo Dian and Hugo Meijer, “Networking Hegemony: Alliance Dynamics in East Asi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7, No. 2, 2020, pp. 131 – 149.

^② 凌胜利、雒景瑜：《拜登政府的“技术联盟”：动因、内容与挑战》，载《国际论坛》，2021年第6期，第3-25页。

和伙伴的合作关系，并重塑和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主导权。^①

而从部分美国盟友的角度来看，尽管积极配合美国的地区战略，但它们对于美国是否具有足够的意愿履行联盟承诺保持怀疑。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执政期间的菲律宾最为典型，杜特尔特曾明确质疑美国在菲律宾与中国爆发南海军事对抗时履行防务义务的意愿，并一度宣称要废除2014年签署的《增强防务合作协议》，这也导致了美菲联盟关系的下降。^② 新上任的马可斯总统就其目前的表态来看也仍然希望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③ 作为美国亚洲联盟体系的核心支柱，日本也担心在中国问题上被美国抛弃。为此，日本积极加强自主军备建设^④，并通过发展与印度、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的安全合作关系来强化安全预期。但日本的这些联盟外举措并未影响其对联盟体系扩张的支持，两者对日本而言发挥着相互补充的作用，既能提升日本从联盟获取的安全利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战略自主性。

（三）地区之间的联盟联结

在推动欧洲和亚洲联盟体系各自扩张的同时，美国还积极对接两大地区盟友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以加强联盟联结。亚欧联盟联结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北约在巴尔干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危机管理行动，作为美国主要亚洲盟友的日本向北约提供了物资支持，双方自此逐渐加强了合作关系。21世纪初，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反恐，考虑到恐怖主义的突发性和跨国性等特征，美国试图以北约为核心，联合其不同地区盟友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反恐，以期从根源上消除恐怖主义。为此，美国积极推动北约与其亚洲盟友和伙伴加强合作。2001年和2005年，北约分别与新西兰以及韩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了正式的对话与合作进程，这些亚洲国家相继成为北约的“全球合作伙伴”。双方合作的重点议题包括阿富汗问题、反恐、救灾、人道主义援助、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总体上，美国欧亚联盟体系在这一时期的联盟联结主要是为了应对全球范围内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

^① 陈积敏、熊洁：《拜登政府“印太经济框架”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8期，第47-49页。

^② Renato Cruz de Castro, “Abstract of Crisis in Philippine – U. S. Security Relations: From an Alliance to a Security Partnership?”, in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5, No. 3, 2020, pp. 477 – 505.

^③ 曹筱阳：《美国与菲律宾同盟关系的强化及其走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6期，第99-103页。

^④ Lionel P. Futton, “A New Spear in Asia: Why Is Japan Moving toward Autonomous Defen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 Pacific*, Vol. 19, No. 2, 2019, pp. 297 – 325.

实际上，美国的中东盟友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也与北约加强了合作。1994 年 12 月，北约与埃及、以色列、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突尼斯共同建立了“地中海对话机制”，以应对地中海南岸地区在冷战结束后逐渐滋生的恐怖主义、非法移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非传统安全问题。^① 约旦和阿尔及利亚随后分别于 1995 年 11 月和 2000 年 3 月加入该机制。在全球反恐战争的大背景下，北约又在 2004 年 6 月提出了“伊斯坦布尔合作倡议”，并邀请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参加，以加强各方在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上的合作。^② 2010 年 11 月，北约还与阿富汗建立了伙伴关系。这些合作都是美国的中东非正式联盟与北约进行联盟联结的实践，目的是制衡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而伴随着中国和俄罗斯与美国的战略竞争逐渐加剧，美国的战略重心也由反恐转向了应对大国竞争，中东地区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随之下降，有学者甚至认为美国应该放弃中东。^③ 在这一阶段，为了维持在欧洲和亚洲地区的权力优势，美国主要推动了北约与亚洲联盟之间进行联结。

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加速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北约对中国的关注也在增强。在 2019 年的伦敦首脑峰会上，北约首次将中国崛起纳入议程，指出北约需要共同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所带来的挑战。^④ 2021 年 10 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Jens Stoltenberg）在接受采访时公然表示：“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将是未来十年北约‘战略构想’中重点关注的领域。”^⑤ 而 2022 年马德里峰会通过的北约新版战略概念文件更是将中国列为与俄罗斯同等重要的竞争对手，提出中国的政策挑战了北约的利益、安全与价值观。^⑥

① 兰子诺：《北约地中海战略调整走向分析》，载《国际观察》，2012 年第 6 期，第 46 页；NATO, “Mediterranean Dialogue”, June 23, 2022.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52927.htm. [2024-04-20]

② NATO, “Istanbul Cooperation Initiative”, September 1, 2022.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52956.htm. [2024-04-20]

③ David Blagden and Patrick Porter, “Desert Shield of the Republic? A Realist Case for Abandoning the Middle East”,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30, No. 1, 2021, pp. 5-48.

④ NATO, “London Declaration”, December 4, 2019.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 [2024-04-21]

⑤ 《北约秘书长：未来 10 年需“关注”中国崛起》，观察者网，2021 年 10 月 19 日。 https://www.guancha.cn/military-affairs/2021_10_19_611398.shtml. [2024-04-23]

⑥ NATO,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June 29, 2022.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iles/2014/assets/pdf/2022/6/pdf/290622-strategic-concept.pdf. [2024-04-23]

在此背景下，美国再度加强了对欧洲联盟体系和亚洲联盟体系的联盟联结。2020年12月，北约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亚洲国家参加外长会议，共同讨论中国崛起问题。2022年5月和11月，韩国和日本还分别加入了北约协作网络空间防御卓越中心。由于北约在2014年威尔士峰会上已经确认网络防御是联盟集体防御的组成部分，因此亚洲地区的网络安全事件理论上可能触发北约的集体防御使命。在2022年6月的马德里峰会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首次参加了北约峰会，2022年版的北约战略概念文件也提出将加强与印太伙伴的合作，共同应对跨地区挑战和维护共同利益，表明美国亚欧联盟之间的联结趋势将进一步增强。

此外，美国还召集主要欧洲盟友和亚洲盟友建立独立的安全合作机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该机制成立于2021年9月，根据三方达成的协议，美英两国承诺支持澳大利亚发展核潜艇舰队，三国还将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海底能力等方面加强合作。^①这一机制也被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称为当下“最重要的战略创新”^②。

四 结论

在大国竞争全面回归的背景下，美国积极推动“轴辐”联盟体系和北约扩张，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然而，美国联盟体系的扩张并非最近才出现，早在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就在欧亚大陆大力推动联盟扩张，而当时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并不存在明确的对手。本文提出，美国推动联盟体系扩张的目的是实现霸权护持，但在不同阶段遵循不同的逻辑。在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前，亚洲和欧洲的地区秩序总体上处在在美国主导的霸权维持阶段，这一时期美国霸权面临的挑战主要源于中国和俄罗斯两个潜在对手的崛起压力，以及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为了制衡这

^①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Prime Minister Morrison of Australia, and Prime Minister Johns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nouncing the Creation of AUKUS”, September 1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9/15>. [2024-04-25]

^② Sarah Basford Canales, “AUKUS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Innovation’ as China Looks to ‘Break’ Australia: US President Joe Biden Advisor Kurt Campbell”, December 1, 2021. <https://www.canberra-times.com.au/story/7533455>. [2024-04-26]

些安全风险，美国积极推动联盟扩张和不同地区联盟之间的联结。而 2010 年和 2014 年之后，亚洲和欧洲分别进入了霸权转移阶段，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关系正式确定。为了对中俄两国进行权力制衡，美国在欧洲继续推动北约扩大成员规模，在亚洲则试图在盟友和安全伙伴之间进行联盟联结；除此以外，美国还积极在欧洲联盟和亚洲联盟之间进行联盟联结。

传统联盟理论通常假定联盟的功能是用于制衡威胁，因此在苏联解体后，许多学者预言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联盟将走向瘫痪甚至瓦解。但这些学者忽略的事实是，即使不存在安全威胁，并且在综合实力上具备绝对优势，美国仍然无法确保霸权绝对稳固。一方面，与美国异质性程度较高的国家可能在未来成长为足以挑战美国霸权的力量；另一方面，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可能破坏国际秩序稳定，进而挑战美国霸权。这些力量构成了美国霸权所面临的安全风险，为了尽可能维持霸权的稳固性和长期性，美国需要对其进行制衡。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选择在后冷战时代继续维持联盟体系并推动其扩张。然而，美国为应对安全风险而采取的联盟扩张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潜在对手的安全利益，导致双方矛盾激化并使得潜在对手最终演变为安全威胁。从这个意义来看，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具有内在的转型动力。

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也需要做好双向准备。一方面，中国需要全方位强化与包括美国部分盟友和伙伴在内的友好国家的合作。历史上的大国竞争很少表现为单兵作战的形式，更多时候需要依靠其他国家的支持。在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的共同围堵之下，中国更需要通过加强与广大友好国家的合作来寻找机会突破包围圈。而欧洲国家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立场差异也表明^①，美国联盟体系内部并非牢不可破，中国甚至可以借机对美国联盟体系进行分化。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保持与美国的沟通机制畅通，避免因战略误判而导致的偶发冲突或冲突升级。一旦处于竞争关系中的两国长期缺乏沟通，那么彼此对于对方行为不确定性的担忧会被进一步放大，因而更有可能对局势做出误判并进而采取冲突行动，而中美直接冲突给两国和全球带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基于此，中美双方应保持对话和沟通，尽可能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冲突。

(责任编辑 黄念)

^① 朱锋、王笑天：《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欧洲角色》，载《国际观察》，2022 年第 3 期，第 97-126 页。